道不凝滞，理贵变通

——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初探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特色经济学实验班 穆齐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变化的重要诱因中国的发展路径由此发生巨大的转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往往基于加入世贸等重要节点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践与经验做出总结与前瞻。但在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时，也需要对其进行带有综合性和历史性的分析，本文综合上述角度的常见视角，对中国经济奇迹与渐进式改革和进行了初步探究，希求增进对这个宏大命题的理解。

“中国奇迹”这一概念本身源自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出版于1994年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三位经济学家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7%的增长和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奇迹”的概念，并以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逻辑和改革的问题与路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出版振聋发聩，其以发展经济学中比较优势为核心 的发展分析框架对中国经济做了极具前瞻性的推导，在当时三位作者所能参考的只是中国在80年代微观领域的改革，实践经验尚显不足，因此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受到广泛的质疑，但是结果证明中国的发展配得上“奇迹”一词。 [1]中国奇迹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4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地位快速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从温饱走向全面小康；社会保障更加健全，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城市化和科教文卫等建设日益完善。表格

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1：历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诸多的经济学家对创造“中国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到底有哪些或者具有哪些特征做了细致而全面且不断发展的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过于综合、复杂，且某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和其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的相关性尚不能明确考察，所以本文选取**解释中国经济的非制度渊源和两个有代表性的侧面来分析中国经济奇迹的简单机理。**

1. 长期与非制度——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奇迹溯源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马歇尔曾经有一句名言：“自然不能创造飞跃。”中国奇迹创造的极高且持续很长时间的边际增长率并非单一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并非许多条件都难以改变的短期因素的影响，而是长期形成的由综合因素决定的潜在经济增长因素的一种实现。计量历史学和比较经济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分析中国奇迹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视角。

**经济史视角的中国经济奇迹往往聚焦于要素禀赋、技术等非制度因素以及经济的制度环境。**彭慕兰等人也基于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大分流”理论，我国的经济在近40多年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历史大分流这一自在的事件经验的回应与吸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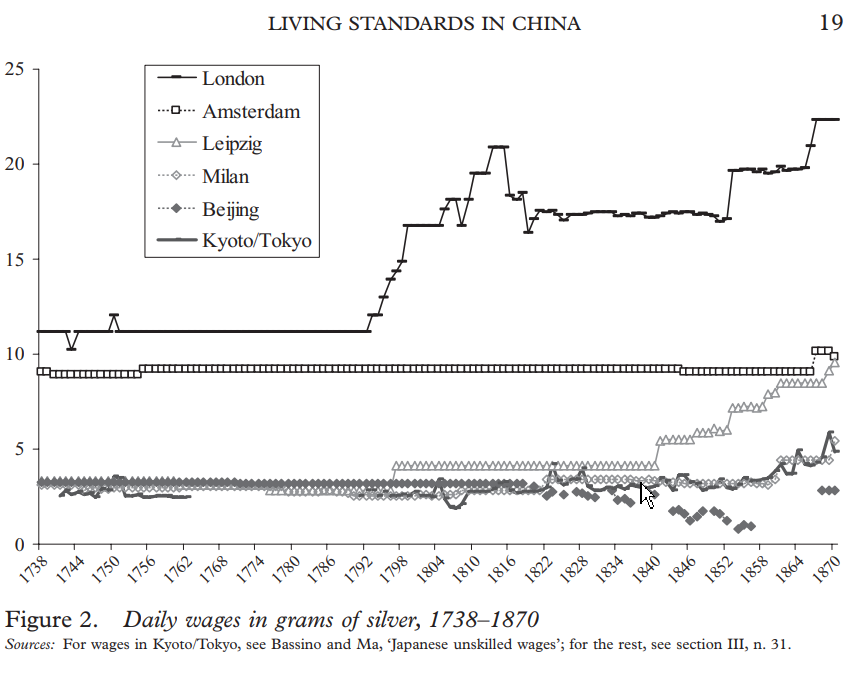
李中清等人对于中国的人口的长期研究表明，中国的人口长期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约等于当时欧美世界的人口总和。在16到17世纪，中国社会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化率、人口增长率还有部分地区的人均GDP）都要显著地强于欧美等西方国家，这一优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甚至持续到18乃至19世纪。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后，中国与西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大不同，总量的萎缩极为明显，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国在1820年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而到了197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9%。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所持有的要素使用具有自发性的观点对解释中国的潜能为何难以得到转化，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李约瑟之谜”也由此提出。但是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此做出了可能的解释，也即技术变革。 [2]

图2：中国、日本与欧洲诸国以银结算的日工资差异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都面临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因素，两方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产生截然的差距：中国正处在封建传统生产力和传统政府组织效率达到顶峰的“康乾盛世”，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和长期宽松的财税政策，中国的人口在巨大存量的基础上快速增长，在1700至1800年间由1.38亿增长到3.7亿，而同期欧洲的人口增长仅60%，这一造成了中国极低的人力成本，但是又由于上述的内敛的政治强制力所形成的“布罗代尔钟罩”使得中国陷入制度性内卷（institutional involution）之中.而同期西方则面临殖民带来的大量货币中的强烈的通胀风险和伴随发现的资源暴利（resource bonanzas） [3]

则使得西方的人力生产面临极高的成本同时使得利用煤等能源的蒸汽机成本大为下降，在资本扩张的权衡中很容易得出对技术和劳动之间进行卡尔多改进的结论。 [4]

当然产权等制度因素对于技术的突破也有很强的催化作用，典型的“先发优势”理论中对于健全的宪政和财产制度这一所谓的“斯密动力”极为重视，认为是制度催生了实践，尽管这一观点的世界观前提有待商榷，不过我们确实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制度乃至于非制度因素对于中西方发展路径的差异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使人们相信，唯一为上帝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就是通过不断劳作来履行个人在尘世间的责任，同时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中的一员。这一“新教伦理”促使人们摒弃享乐，积累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道德基础。但是，在明代对应的重商主义的非正式制度如行会还有“儒商结合”的所谓契约精神也已经产生，而且后世的Sascha O. Becker [5]等人结合动态模型的分析也表明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催发了宗教改革，不过这种观点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非制度因素背景，塑造了新的约束机制和技术选择逻辑。

以上的种种分析，与中国奇迹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形成发展有着间接和一般性的联系，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其形而上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生产及效率的基础性作用，资源的催发作用和制度因素及其非制度背景对于经济转型远超想象的能动与激励作用。**我国的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刻转变了我国发展的激励机制，同时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也拓展了能源发掘的可能性边界，以及整个社会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变化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新的文明间此消彼长的重要因素，“事不凝滞”，时势在永恒的变化当中，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大分流”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以及之后的救亡探索都有极大的影响， [6]邓小平曾对四人帮的“闭关锁国”政策有过严厉的批判，中国的奇迹未尝不是当年传统中华文明倒下传导出的惊涛骇浪。

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前最不应该忽略的历史时期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辅以前期的苏联等国的外援，完整建立起了一套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综合工业体系。我国的电力、化工、交通、邮电等事业都取得极大的成果，国防工业等产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原来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因为“三线”建设建立起一批新的工业基地，1980年我国的工业经济与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的1952年相比固定资产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且主要工业品的产值都有很大提升，其中机械工业的产值增长53倍，达1270亿元，极为突出。总体上看，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我国建立起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我国日后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发展后都面临的因为重工业缺失而产生的发展陷阱。

这个时期工业化思想遵循了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以特殊的生产关系下农业提供的剩余为工业化的资金，同时兼顾产业平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重工业要优先但必须要均衡农轻重关系，沿海还有内陆的产业布局协调等问题，陈云也在工业化建设时期提出过“三主体三补充”的复合协调的经济学观点，党的历次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强调协调的重要性。更为健全的产业结构长期的积累促发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的计划经济也留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商品交换从来没有被完全禁止，囿于产业结构的差异，我国的计划经济委员会在成立之时就没有负担苏联那样全面且极高程度的经济计划任务，同时我国基层的企业管理制度也是以党委的集体领导为特征，重视普通工人的管理意见，这与苏联的一把手负责的厂长制度产生了重大差别。这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首创行为频频产生，民间首创是推动中国改革的重要源泉，“鞍钢宪法”的精神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党的改革人才队伍也因此不断壮大。

相较于古典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定的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党的一系列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健全的工业体系、充足的实践经验和可靠的人才队伍共同在新的历史时期铸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1. 以开放倒逼改革——中国对外开放对于经济奇迹的作用

在杨小凯先生与林毅夫先生经典的“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对辩当中，双方的一个重要的辩论焦点便是对于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的争论，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特别是早期的发展，其动力表现出很强的政策外生性，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与资金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发展生产所欠缺的物质资本和经验的不足，在这方面的改革中强制性改革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而诱致性改革则占据了主要地位，以下对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八大期间的两个重要的对外开放浪潮中的重要特点做一些浅析。

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一个阶段（1978-2001）当中，**比较优势理论得到充分的应用，这为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充分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剩余的积累基础。**大卫·李嘉图最早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拓展了斯密绝对优势的国际交换的观点，提出了各方面都生产潜在损失最小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的理论，之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在具有相似偏好和效用曲线的理想模型中进一步验证了比较优势的合理性。 [7]我国作为一个当时贫穷落后、资金尤其匮乏但是劳动力和土地等重要资源禀赋极为充沛且由于长期的独立自主建设而有着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的国家，对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精准把握和及时利用彰显出我国特别是我们党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战略眼光，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政策开始松动，一批以出口创汇为目的的国资或者三资的企业出现，在经济特区当中实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导向的驱动机制改革使得微观主体参与经济的激励因素得到很大增强，经济特区作为一种相当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其在局部打破了上述的布罗代尔钟罩并且能够专注于效率的构建。效率的构筑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于微观主体和分工的干预有序减少和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分工的深化，这其中市场因素的逐渐增加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

当然这种转轨都是建立在政策的推动下，这种政策的驱动对于开放的早期成功必不可少，同时也塑造了早期开放针对于某种特殊使实用目的这一特点。由于三资的引进区域和行业的极大限制，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力价格上，而且由于需求的严重不足，这些早期的经济表新出极强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向，这种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但是易流于粗放的对外发展模式表现出极强的活力，1985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总额只有47.6亿元，但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481.33亿元，同时对外贸易带来的大量就业使得我国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对GDP实在的驱动作用，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升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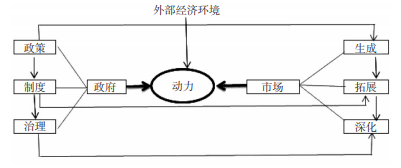
在我国的两个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特别是第二个发展阶段，**我们的对外开放中展现出的对于生产力发展本身的关照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外贸易理论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承认国际贸易的自由交易倾向，但是并不盲目鼓吹一种无摩擦的国际市场交易体系，他认为国家间的贸易应该遵从一种更为广义的公平，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外贸商品的高度资本化本身就包括了对于落后国家倾销和恶意竞争所获得的剩余。恩格斯则认为关税是保护弱小国家产业的武器，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着受资本扩张规律影响的内在逻辑，后发国家必须要实施贸易的保护政策，当生产资本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才可以顺应国际竞争环境参与竞争，归根到底，马恩对于贸易政策的核心认识始终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依托，以综合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贸易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不是激进的完全融入，而是具有自身冷静思考的权衡的结果。 [8]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之后就对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吸引力问题和可持续的问题产生担忧，他认为我国的支付能力在国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因此在前期的开放实践和政策的铺垫下，1984年3月22日，国务院在同意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这是国家首次对“以市场换技术”进行战略定位。在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建立制度性的对外开放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和部分行业转型的需要已经使得我国较开放初期要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市场和产业的建设状况，而“以技术换市场”等有利于构建国内产业发展新格局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升级与强化。1992-1997年间“以市场换技术”在一边调整中一边施行，其显著特点是高速推进和深入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外资项目和金额成倍增长。仅1992年政府直接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就多大48764个，超过了之前二十余年的项目总和。二是投资领域的大幅拓宽。使用FDI的领域扩展到一二三产。三是国内市场开放加快，内销比例进一步放宽。部分轻工业领域甚至要求100%内销。这种对于外资的大规模引进和对其在利于我国自主发展的某些方面的更高要求表现出我国“独立自主”的属性仍未改变，同时也表明我国的消费能力得到激发后对于本国经济更为巨大的拉动作用。 [9]

图3：中国对外开放动力的转变 [10]

中国经济奇迹第三阶段的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主、可持续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开放顶层设计的关键，其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使得这种制度开放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进行，2000年10月31日，按照WTO规则和入世的承诺，中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条款、“当地含量”条款、出口比例要求和企业生产计划备案条款等。我国经过长久的努力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定给我国国内的企业在新的开放情况下逐步试错和生存的机会同时前期的资金和技术积累也使得国内的企业具有了培育自身全产业链竞争力的能力，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向劳动力和资金并举的方向转变。因此，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也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由“市场换技术”正式转向“自主创新”。生产领域多元混合动力的产业格局给予我国经济强劲的动力支持，外来资本这条“鲶鱼”并没有让中国的企业失去所谓国际竞争力，相反很多管理经验在国内也得到落实，有价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的引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企业效能的提升。2007年我国只有28家企业上榜世界500强，但到了2013年左右已经可以达到130家，可以说我国微观市场的活力被极大地调动出来。

对外开放是中国取得发展的关键一招，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时间与世界经济隔绝，中国在20 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启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2001 年加入 WTO 开启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和中共十八大开启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浪潮，基本赶上了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规则的潮流。但是，**无论中国的经济体制如何改革，无论如何与国际经济规则相一致，无论引入多少国际经贸规则与规范，中国都未改变自身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借助于市场经济和全球规则的壳，让中国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让国际经济制度和经贸规则与中国的体制相容，让中国的经济体制、企业制度、宏观调控机制、经济运行规则得以创新发展，从而开创出一种新的制度与规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也正是因为这种逻辑我国的对外开放总是能够作用于国内改革和发展大局，为我国的经济奇迹创造破局的关键性的源动力。

1. 合抱之木，起于毫末——渐进式制度改革与中国经济奇迹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作为事物外部矛盾一部分的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它是第二位的,只是起到对于事物发展的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它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国的对外开放依照“独立自主”的逻辑日益深入就是为了在对外开放短暂的直接红利期之后，开放能够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为我国的生产力变革提供经验和一定的动力**。纵观当时的世界，不少国家如日本、墨西哥等也采取了和我国类似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且在短时期内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长期发展当中都会面临种种生产关系方面的瓶颈，东欧国家的激进生产关系变革则没有前期的经济与外交的准备而陷入转型失败、国民经济剧烈转轨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的困境当中。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与渐进的制度转型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中国的奇迹》这一书中最早提及的“中国奇迹”范式也是建立在中国一定程度上的宪政转轨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实行逐步的制度创新以修正制度供给的不均衡性的改革路径具有较低改革摩擦成本和较强灵活性等明显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在我国拉开了渐进式制度变革的历程，1978年的工作重心转移标志着我国渐进式的生产关系调整大幕的展开。1978-1992年是制度变革的探索阶段，小岗村到《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走出了一条由“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渐进式改革范式。同时在全国实践深入的基础上，1984-1985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国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在制度层面上为农村原有的经济松绑。同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9]使得改革由农村拓展到城市，这既符合长期的城乡协作顺序，同时是在城市生产样态更为复杂的条件下实行“增量改革”以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与损失。 [12]在认识论层面，渐进式改革对于市场的定位极具代表性，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认识的改进很快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商品价格与金融财税系统的改革。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减弱，但市场自发的力量也并没有野蛮生长，国有控股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0年的54.6%,这激发了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经济的近70%贡献率，事实证明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历史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表现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手机屏幕截图

中度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图4：国有企业数量及其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

1992-2012年是市场化导向的渐进式改革的加速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关键时期，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思想领域为改革实践进一步张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内部思想解放和外部开放深入的情况下被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同对外开放一样，中国的体制改革也是在自发改革的基础上起步，在顶层设计的规划下走向深入，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个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取消了价格双轨制，中国进入了制度化的市场主导阶段。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9]则明确了在世界贸易框架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市场制度变革的细节方向，这些方向都是当时与世界接轨的大背景下中国所急需的制度供给。

理解渐进式制度变革一直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命题。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主要还是集中于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巴里·诺顿著述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富有远见地估计中国经济到2025年前都会保持6%-8%的增长，并把政府的全面干预认作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关键。在中国奇迹的中国解释中，中国的渐进式制度变革自身具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融合强制性变革与诱致性变革、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辩证统一、降低改革风险等优势 [14]，其对经济的作用被总结为三个方面：1．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厉以宁认为，30多年的改革道路，**产权改革是基础，通过产权改革，建立了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所有制的单一化走向所有制的多元化**。2.转变发展方式：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林毅夫、蔡昉、李周认为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外向型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础。3．劳动投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一是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数量的 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蔡昉、王德文通过测算 1982—1997 年劳动力投入对 GDP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上述三个因素贡献份额分别为 23.71%、23.7%和 20.23%，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保持了高储蓄率。1978年以来，我国储蓄 率平均为 38.7%，2002 年以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至2006 年已经达到 50.1%。高储蓄率可以使中国在不依赖于外国的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三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张国富认为，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就自身的情况来看，技术 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也是不断上升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30%左右。

1. 便国不法古——中国经济奇迹经验的综合分析

以上各个结论均是参照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具体实践和部分理论结合的具体经过，重点表述了中国改革获得经济成功的外贸和制度改革两个侧面，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制度或是非制度层面的原因并没有集中的总结和分析。下面是对于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简单综合分析与概括。 [10]

1. **政治原因：**
2. 社会制度：**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11]郑友贵认为，以人为本，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此推进改革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这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二是奠定了平等的社会基础**。姚洋认为，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其结果就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平等社会。**三是提供了可以稳定持续实施长远发展目标的政治制度保障**。“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长期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3. 政府因素：**一是中性政府是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的关键因素**。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不代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也不会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更关注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更关注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二是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是产生“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周黎安认为，把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称为“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质和经济结 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特别是地方行政制度在经历改革后，地方的财政权被缩小，因此在有限的范围内追求最大的收益便成为绩效考核的有效标准和地方改革的驱动力。
4. **文化原因：**

这方面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层被人们广泛性的忽略，中国经济奇迹的探讨往往还是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人文科学在构筑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体系中长期保持着沉默“北京共识”的论文或许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惊鸿一瞥，但未引起深沉的理论关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塑造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12]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精神现象，分析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它对解释中国道路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学科本性所规定的比较优势和穿透历史表象的理论力量。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修齐治平”和“至大至刚”的伟大抱负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同经历的苦痛的共同记忆都为中国改革开放积蓄了社会心理条件，同时传统文化塑造下的“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各项宝贵精神财富都是驱动着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与变革的重要非制度因素。

1. 小结——中国奇迹延续的可持续性展望

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稳定前进**。一方面，中国经济原有的高水平劳动力众多、工业结构完善、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重要等优势在新时代仍旧存在；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进一步深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3]中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深入阐释，在发展动力的调整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坚持稳中求进，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发展格局方面，我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相辅相成，共同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增强经济内功；在全面开放的新阶段，我国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包容性发展。中国体制在新时代彰显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总书记也曾用“道不凝滞，理贵变通”来形容改革的伟大首创性，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全面改革，创造更大的经济奇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引用

|  |  |
| --- | --- |
| [1] | 石剑锋, “20年后回望出版于1994年的《中国的奇迹》,” *澎湃思想,* 编号 11月, 2014. |
| [2] | J.-P. B. D. M. M.-M. J. L. V. Z. ROBERT C. ALLEN,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pp. 8-38, S1 2011. |
| [3] | K.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4] | R. C.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 [5] | S. O. B. L. Wößmann, “Was Weber Wrong?,” *University of Munich, Ifo Institute, CESifo, and IZA ,* pp. 1-33, 20 4 2007. |
| [6] | 郭金兴, “中国经济增长30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政治经济学评论,* pp. 1-25, 1 2 2008. |
| [7] | 裴长虹，刘斌,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 pp. 46-69, 2 2020. |
| [8] | 赵茜, “马克思恩輅斯的国际贸易政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社会主义研究,* pp. 31-37, 2 2021. |
| [9] | 王跃生，边恩民，张羽飞,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三次浪潮——兼论 RCEP、CECAI、CPTPP 的特征和影响,” *改革,* pp. 76-87, 5 2021. |
| [10] | 邓远秀, “中国经济40年对外开放的动力变迁及其经验启示,” *改革与战略,* pp. 25-31, 10 2018. |
| [11] |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新华社, 北京, 1984. |
| [12] | 邓于君, “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理论基础,”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pp. 50-53, 2 2000. |
| [13] |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新华社, 北京, 2003. |
| [14] | 郭威,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演进、逻辑机理与借鉴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 pp. 121-127, 5 2019. |
| [15] | 李志兵,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研究综述——基于成就、原因、可持续性的分析,” *改革与战略,* pp. 46-53, 6 2018. |
| [16] | 郑友贵, “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pp. 30-35, 10 2015. |
| [17] | 侯亚楠，郭忠义, “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的多维解读评述,” *党政干部学刊,* pp. 4-11, 7 2017. |
| [18] |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新华社, 北京, 2013. |